

## 批評與回應

# 「去政治化」還是「泛政治化」？

## ——重新進入1960年代

• 滿 永

1968年5月，巴黎學生湧上街頭，由此引發了法國乃至歐洲歷來最為嚴重的學生騷亂——「五月風暴」。騷亂發生前後，巴黎眾多知識名流如薩特 (Jean-Paul Sartre) 和阿隆 (Raymond Aron) 等也加入了抗議行動。此事件也被研究者認為可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sup>①</sup>。與此相呼應，亞非各地也相繼爆發了蓬勃的民族解放運動，美國和歐洲的反戰運動亦轟轟烈烈。總之，1960年代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運動的年代，反叛的年代，激進主義興起的年代。

中國無疑處於這個反叛年代的中心地帶，許多激進主義運動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關聯。正如有學者在強調文革的世界意義時所指出的<sup>②</sup>：

中國的文革已超出中國國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部分，並特別深入地影響全球各地的政治運動。從法國的林蔭大道到秘魯的貧苦鄉村，文革不僅在理念上提供了反抗不平等戰略的原則，同時在實踐上也提供了激進變遷的經驗。

暫不論世界範圍內的激進政治運動與中國的毛澤東思想有着多大的內在關聯<sup>③</sup>，僅從面向上看，回想世界

的1960年代，勢必要首先進入中國的1960年代。

自1998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紀念1968年學生運動和政治運動的活動迭出，然而中國卻對此保持了沉默。或許出於對此種沉默狀況的不滿，汪暉曾撰〈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sup>④</sup>，以期喚醒人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sup>⑤</sup>。汪文的核心內容是，分析自1960年代以來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去政治化的政治」之生成過程，其中融會了作者對「1960年代」消逝的淡淡憂愁。同時，文中提出了諸多理解中國1960年代的關鍵性問題，雖然有些未作深入討論，然問題的提出有助於反思的進一步深入。筆者受此啟發，這裏僅就1960年代之於中國和世界的不同意義、中國1960年代的內涵，以及國家與政治的關係等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 一 1960年代之於中國和世界的不同意義

1968年，湧上街頭的巴黎學生抬着毛澤東的巨幅像遊行，一部分毛主義者結成「毛派」，這意味着這場「五

1960年代稱得上是一個運動的年代，反叛的年代，激進主義興起的年代。中國無疑處於這個反叛年代的中心地帶，許多激進主義運動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關聯。回想世界的1960年代，勢必要首先進入中國的1960年代。

月風暴」與遙遠中國的關係。至少從表面上看，毛主義似乎已成了1960年代法國學生運動的力量源泉，不少人以此來探討文革的世界影響<sup>⑥</sup>。但穿過歷史的表象，人們要找出學生運動與毛主義之間的內在關聯，卻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當時法國乃至西方的激進運動雖然表面上與毛主義有着絲縷般的聯繫，但其內容卻與毛主義直接影響下的中國學生運動有着根本的差別。在世界激進運動中，毛主義已然成為運動的象徵，並無太多實質意義。很顯然，1960年代之於中國和世界有着頗不相同的意義。

有學者指出，在巴黎的「五月風暴」中，「學生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在於法國的內政問題：一是戰後法國僵硬、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裏服從成了最為崇尚的品格；二是戴高樂的精英主義和法國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和青年一代的輕視。」<sup>⑦</sup>同時，「五月風暴」還受到了由薩特等人領導的反戰運動的影響<sup>⑧</sup>。由此可見，「五月風暴」基本上是一場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反叛式」運動。由於運動本身並不限於國家影響的範圍，因此國家對運動本身的控制力度也有限。巴黎「五月風暴」的典型特徵在於社會與政府的對抗，這一點，與文革時期中國的學生運動有明顯差別。

一般認為，〈五一六通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言。〈通知〉的精神是階級鬥爭式的，旨在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它要求參與者「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

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sup>⑨</sup>。這樣的目標，表明文革不會是一場自下而上、自我反思的社會運動，而是出於權力最高層對所謂「資產階級奪權」的憂慮。換言之，中國的激進主義運動是一場以階級鬥爭的方式，本着捍衛並純化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自上而下發起的政治運動。這與西方的激進主義社會運動有着本質差別。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到「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這一思路成為文革「造反有理」的合法性根源。同在這封信裏，毛澤東對以「造反」實現天下大亂的目的有着清醒認識，「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sup>⑩</sup>很顯然，無論是「天下大亂」，還是群眾造反，在毛的意識裏，其對象都是當權的「反動派」。

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造反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共領導機關，並給各地的群眾運動衝擊當地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提供了理論依據<sup>⑪</sup>。8月9日，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形式上，正式提出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同時雖強調「要用文鬥，不要武鬥」的方法，但也指出鬥爭「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sup>⑫</sup>。這種半推半就的表示，非但未能阻止

「五月風暴」的典型特徵在於社會與政府的對抗，這與文革時期中國的學生運動有明顯差別。中國的激進主義運動是一場以階級鬥爭的方式，本着捍衛並純化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自上而下發起的政治運動。

各地已經出現的武鬥現象，實際上還是對武鬥的一種無聲支持。這些都表明，無論是文革初期大鳴大放的文鬥，還是一定程度上的武鬥，都是在國家默許範圍內的，並未游離出國家的許可。

在汪文的表述邏輯內，「『文化大革命』是在政黨的國家化過程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在政黨國家化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社會動員，亦即在黨一國之外激活政治領域和政治價值，形成大眾參與性民主，構成了『文革』初期的特點之一。毛澤東重申革命政黨的政治價值，試圖通過社會運動和政治辯論打破政黨與國家的絕對權威，目的是重構一種包含着自我否定態勢的社會體制，即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一個通向自我否定的國家和一個自我否定的政黨。」<sup>④</sup>如此認識顯然是對文革理念的一種想像性價值重構，無形中提高了文革的革命價值理念。

這裏至少存在兩方面的認識誤區。一是毛澤東到底要革誰的命？雖然「炮打司令部」，但「司令部」是「資產階級的當權派」，並不是國家抑或黨的權威，也很難說是政黨的國家化抑或官僚化。事實上，毛並不絕對反

對秩序化的「文化革命」，同時認為文革可以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關鍵是工作組執行怎樣的方針、政策。由此看出，毛的「文化革命」並不是簡單的反體制、反官僚化，他所關注的核心仍是這個體制究竟遵循着怎樣的路線。換句話說，文革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場路線之爭。如汪文所說，「毛澤東在發動群眾衝擊國一黨體制時不得不訴諸於個人的威望」<sup>⑤</sup>。但他恰恰忽略了直至今時毛仍然是黨的主席。雖說文革衝擊了黨的組織體系，但以毛為象徵的黨的權威機制本身並未受損。恰恰相反，文革正是在維護黨的權威合法性基礎上所進行的一場純化無產階級隊伍的政治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文革所反對的不是黨的官僚化，而是黨的「資產階級化」（或「修正主義化」）。

再者，後來者對於文革參與群體的認識也被「群眾運動」的言稱所誤導。汪文即認為文革存在着一種「大眾參與性民主」<sup>⑥</sup>。先不論參與大眾的主體性是否存在（文革本質上仍是一種動員式政治參與，這是其後來能夠迅速走向國家化的重要因素），單就參與大眾自身的群體屬性就是值得懷疑的。在此意義上，筆者寧願將其看

汪暉認為文革存在着一種「大眾參與性民主」。筆者寧願將其看成一場激進政治運動，而非群眾運動。至少從已有的資料看，文革中激進政治參與主體多是青年學生，一般大眾的參與度並不是很高，沒有一種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文革反對的是黨的「資產階級化」。

汪暉顯然有將文革中的激進運動從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歷史中作「特殊化」處理的傾向，1960年代的「去政治化」特徵始在作者的表述邏輯內凸顯出來。然而，他所懷思的「1960年代」只能是自己表述邏輯內的，而不是歷史中的「1960年代」。

成一場激進政治運動，而非群眾運動。至少從已有的資料看，文革中激進政治參與主體多是青年學生，一般大眾的參與度並不是很高，沒有一種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一點在廣大農村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皖北的李村，「『文革』沒有像在城市那樣搞得那麼過頭，在這裏很少發生暴力衝突。」<sup>⑤</sup>而山西張莊上了年紀的農民，則「都以懷疑的態度，看待他們本鄉本土發生的所有的造反行動」<sup>⑥</sup>。當然，也有不少農村出現過「造反派」或「紅衛兵」組織，但這些多是以城裏的下放青年或在外讀書的學生為主力<sup>⑦</sup>。這樣的情形說明，文革並非一場普遍意義上的「群眾運動」，更像是青年人的狂歡。

反思的前提在於充分認識到，1960年代之於中國究竟意味着甚麼。至少在筆者看來，中西方的1960年代雖然都內含激進政治的成份，但內容卻是很不相同。西方的激進運動更多體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有着很強的主體意識。同時，這種社會運動更多是一種社會與政府的對抗，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社會空間的政治化」<sup>⑧</sup>；而中國的激進運動雖然表面上也衝擊了國家與黨的官僚體制，呈現出一種遏制黨—國體制異化的價值追求，但實質上並未能真正衝擊黨一國的合法性。在實質意義上，中國的激進運動仍是一種自上而下、國家動員式的政治運動，參與群體也缺少相應的主體意識，紅衛兵仍是「毛主席的孩子們」<sup>⑨</sup>。

## 二 作為事件的1960年代

1960年代首先是一個時間概念。但是，簡單將之理解為連接中國兩個

歷史階段的十年，則不具歷史意義。1960年代的意義在於其事件性。事件史的1960年代可以看作一個時代的象徵或代表。在事件史的視野裏，需要將1950至60年代連續性地加以理解。因此，僅從時間上去釐定1960年代的意義，也就容易將其顯現出的某些現象獨特化，從而遮蔽人們對它的理解。

至少在筆者的閱讀中，汪文所謂「消逝的1960年代」更多應從時間上去理解，其所關注的1960年代尤以文革中的激進政治運動為代表。作者顯然有將此激進運動從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歷史中作「特殊化」處理的傾向。正是通過這種處理方式，1960年代的「去政治化」特徵始在作者的表述邏輯內凸顯出來。然而，「特殊化」處理的危險性也是顯見的，至少會導致對社會主義國家品格理解上的偏差。最終，作者所懷思的「1960年代」只能是自己表述邏輯內的，而不是歷史中的「1960年代」。

在汪看來，文革的根本問題在於「在國家繼續存在並不斷加強的條件下，作為『群眾嚮導』的革命黨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進而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着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即包含着參與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sup>⑩</sup>而文革所要實現的目的，在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給林彪的一封信（即後來所稱的〈五·七指示〉）中有清晰表述。在這個號稱文革「立」的綱領性文件中，毛勾勒出一個亦軍、亦工、亦農、亦學的美好社會藍圖，而貫穿此藍圖的則是對資產階級的批判<sup>⑪</sup>。這裏暫不论文革的反官僚化與反資產階級化之間有着怎樣的內在關聯，就以反官僚化而言，毛的認識，既非始於文革時期，同時也有着自己的獨到理解。

早在掌握全國政權之前，毛對共產黨的官僚化傾向就比較警惕。正是基於這樣的憂慮，他才在1949年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發出了「戒驕、戒躁」的警語。為了盡可能避免官僚化傾向，共產黨首先在黨內確立了一系列預防措施。最為典型的就是借用了延安時期解決思想問題的「整風」教育，以及土地改革中「整黨」的鬥爭形式。進城之初，共產黨即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整黨運動」，緊隨其後的則是1951年12月開始的「三反」運動<sup>26</sup>。不過，以上這些反官僚化運動都有着一個共同特點，即運動只限定在黨內，基本上是在官僚制的基礎上反官僚化。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共產黨改變了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按照同年中共八大的表述，此時的社會矛盾已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過渡到「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sup>27</sup>。與這種社會性質轉變不相應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化傾向卻在日益加重，毛澤東在11月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言中流露了這種憂慮<sup>28</sup>：

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面對此景，之前在官僚化體制內部反官僚化的行動，似乎已無法起到遏制官僚化的目的。在社會矛盾已經轉變的情形下，有着更強自信心的共產黨

開始考慮將之前借「整風」來遏制官僚化的措施推向社會。於是，也就出現了1957年初的「整風運動」<sup>29</sup>。

此次整風的不同之處在於首次借助社會力量進行黨內整風。按照汪文的理解，這也可以算是一次強調「政黨政治社會化」的嘗試<sup>30</sup>。至於整風的目的，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明確指出<sup>31</sup>：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都是官僚化的特徵，而此次整風反官僚化的目的也是為了「改進作風」，並非是對官僚體制的反動。這可能就是今天我們與歷史上的人們對「官僚化」理解上的差異。

在共產黨的邏輯內，官僚化的最主要表現便是脫離群眾，而並非官僚體制本身的異化。1983年，周揚曾從「異化」的角度討論社會主義下的政治問題，「由於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與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sup>32</sup>汪文中對官僚化的理解，類似於周揚的「權力的異化」。不過，周揚的這個「異化」論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認同，甚至在鄧小平看來，強調「異化」無疑是在否定社會主義<sup>33</sup>。這個爭論表明，共產黨邏輯下的反官僚化目的僅僅是整頓作風，以提高官僚體系

1957年初的「整風運動」中，共產黨邏輯下的反官僚化目的僅僅是整頓作風，以提高官僚體系的工作水平，而不可能是對這種體系的全面反思。這種理解同樣適用於文革期間的反官僚化。

的工作水平，而不可能是對這種體系的全面反思。這種理解同樣適用於文革期間的反官僚化。

為了盡可能發動社會力量參與黨內整風，1957年5月4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於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強調了社會參與整風的重要性。為此，中央統戰部曾多次召開座談會，邀請黨外人士參與整風。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各級黨委也召開了形式多樣的整風座談會，共同推動了此次整風運動進入高潮<sup>②</sup>。

令許多參與整風的黨外人士始料未及的是，自己幫助黨整風的話音未落，形勢便急轉直下。僅僅十天之後的5月15日，毛澤東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標示了整風向反右的轉變：表面上仍是不停地鼓勵整風，但此時的目的已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了。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黨對整風過程中「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的憂慮<sup>③</sup>。在官僚化與階級鬥爭面前，共產黨首先關注的仍是階級鬥爭問題。一旦有誰撥動了階級鬥爭這根神經，共產黨的過敏反應也就難以避免。根本的問題在於，在黨一國一體化的機制下，離開黨來批評官僚化何以可能？且不說，整風中對黨的批評是否內含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思，僅從整風向反右的轉變來看，反官僚化與反右雖然形式不同，但其目的都在於維持黨在社會政治生活領域內的絕對統治。反官僚化同樣是一種基於統治的策略，並不具有反「異化」的理想色彩。

整風中國家政治社會化的嘗試終以反右的形式草草收場，其根源還在於這種動員式的社會政治參與機制。在動員式參與機制內，被動員者沒有

主體性可言，參與的程度與參與的形式都受到動員者的限定，這也是動員式政治參與和現代民主式政治參與的最大不同。在動員體系內，動員權威始終掌握着政治主動權，可以隨時改變政治方向，整風的瞬間轉向便說明了這一點。

談及二十世紀的政治遺產時，汪文指出：「二十世紀也產生了政治不等於國家的政治實踐，產生了將參與性與制度構架相互結合的嘗試。」<sup>④</sup>而在作者看來，文革初期的群眾政治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將政治從國家解放出來的嘗試，可以稱得上是國家與政治分離的重要表徵。文革初期的「四大自由」是這種分離的具體形式，只是由於後來暴力現象的出現，導致這種政治再次社會化的步伐匆匆結束。汪文指出<sup>⑤</sup>：

「文革」中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試圖通過大眾參與突破黨一國官僚體制的框架，但由於這些鬥爭本身與群眾運動內部的派性鬥爭和黨一國體制內的權力傾軋糾纏在一起，導致了大規模群眾暴力和政治迫害，早在一九七六年之前，六十年代在許多中國人的眼中已經黯然失色。

「四大自由」的終結固然與群眾暴力和政治迫害有關聯，但如過於強調了暴力的決定性，則對此次政治社會化運動的理解難免偏頗。我們可以在與1950年代的比較中來加深理解。

「四大自由」並非文革首創，早在1957年的整風中，「大鳴大放」便已出現，而「大字報大辯論」更是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中已露崢嶸。這裏僅以「大鳴大放」為例。1957年6月6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指出：「各省市一級機關、高

「四大自由」是在充分反資產階級化的基礎上，重塑社會主義政黨的政治權威，一旦其影響到這種政治權威的塑造，終結的命運就無法避免。從中可以發現，即便在文革初期那種看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中，政治與國家的分離也不可能真正到來。

等學校及地市一級機關用大鳴大放方法的整風，請即加緊進行。」<sup>②</sup>整風中的「大鳴大放」並未如文革那樣引發群眾暴力，但卻同樣沒能持續下去。關於結束的原因，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明確說法：1957年「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sup>③</sup>。「大鳴大放」從整風形式到右派「進攻」手段的轉變，充分說明了問題所在。顯然，黨所關心的並非「大鳴大放」這種形式是否群眾政治參與的有效形式，更多地是自身政權的權威問題。「大鳴大放」最初的出台是力圖塑造社會主義的政治權威，同時它又必須在權威許可的範圍內進行。

實際上，文革中「四大自由」的終結也不是對暴力的憂慮。毛澤東借助「四大自由」衝擊的是黨和國家的資產階級化，而不是要實現全社會範圍內的無政府主義。「四大自由」是在充分反資產階級化的基礎上，重塑社會主義政黨的政治權威，一旦其影響到這種政治權威的塑造，終結的命運就無法避免。文革一系列鬥爭的矛頭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來都不是黨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權威本身。即便毛澤東本人，也仍然要借助黨的權威合法性來推動文革。紅衛兵發動奪權的目的是要掌握國家的權威機構，革命的核心問題仍是爭奪體制化的政權。毛的「大治」仍要借助於國家政權，而文革充其量只是一場純化政權內部官僚機器的運動。從「四大自由」的命運中，可以發現，即便在文革初期那種看似無政府主義的狀

態中，政治與國家的分離也不可能真正到來。

### 三 國家與政治：分離抑或融合？

在施米特 (Carl Schmitt) 看來，政治概念的核心是敵我劃分<sup>④</sup>。而毛澤東1925年對革命首要問題的理解無疑是施米特政治概念的中國版。「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sup>⑤</sup>依此標準，階級鬥爭應是革命政治的當然內容，而以「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主要內容的文革則可稱得上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期」。這一點，汪文引述魯索 (Alessandro Russo) 的文革研究予以證明。不過在魯索看來，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文革卻終結於自身的「去政治化」<sup>⑥</sup>：

這個政治化時期的終結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源自七十年代中後期，而是產生於「文革」開始後逐漸發生的派性鬥爭，尤其是伴隨派性鬥爭的暴力衝突，亦即產生於六十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開的政治辯論、多樣性的政治組織以及以此為基礎產生的政治文化瀕於危機，並提供了黨—國體制重新介入並獲得鞏固的契機。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的終結產生於一個「去政治化」過程。

從這一段表述中，我們能夠體會出作者對文革初期政治文化消逝的遺憾。

同樣借助這段表述，亦可發現汪文所謂「去政治化」，就是政治與國家的分離，分離的表現就是政治從國家

在「去政治化」的命題下，我們無法理解文革中派性鬥爭與暴力衝突的產生。但在「泛政治化」的前提下，一切都變得容易理解。汪暉在高估政治辯論及多樣性政治組織的政治內涵的同時，卻將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非政治化，無疑將二者簡單化了。

「寧左勿右」的思維是社會「泛政治化」的最鮮明體現，它將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化、階級鬥爭化，從而便於以階級鬥爭的方式處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就是這種「上綱上線」的結果。

的藩籬中解放出來。而政治辯論、多樣性政治組織的出現則是毛試圖實現這種政治與國家分離的嘗試，是一次大眾民主的試驗。暫不論毛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否在於衝擊黨一國官僚體制（毛對黨一國體制資產階級化的憂慮顯然重於對其官僚化的憂慮），單從實踐層面看，政治辯論、多樣性政治組織的出現是否在國家政治之外的社會性政治嘗試，就值得商榷。

事實上，高度政治化絕不僅僅是文革時期的特徵，而是共產黨國家的最基本特徵。而將社會政治化、國家化則一直是共產黨國家的統治策略<sup>②</sup>。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共產黨社會存在着一種普遍的「泛政治化」。在「去政治化」的命題下，我們無法理解文革中派性鬥爭與暴力衝突的產生。但在「泛政治化」的前提下，這一切都將變得容易理解。汪文在高估政治辯論及多樣性政治組織的政治內涵的同時，卻將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非政治化，無疑將二者簡單化了。正如前文所言，文革時期的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雖然不乏「怨恨」情緒的爆發<sup>③</sup>，但總體上看，他們仍都屬於政治鬥爭的範疇，不僅沒有「去政治化」，而恰恰是高度政治化的。在對共產黨社會的「泛政治化」特徵有了初步了解後，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的政治性，以及它們產生的原因或許會有更清晰的線條。

本文所提「泛政治化」中的「政治」是施米特意義上的，這也是毛對革命政治的理解。這種劃分敵我的政治，在1950至60年代的時空背景中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而「泛政治化」也可相應稱之為「階級鬥爭擴大化」。1957年整風為我們認識共產黨社會的「泛政治化」特徵提供了一個典型事例。

按照薄一波的回憶，1957年整風中被錯劃的「右派份子」的改正結果表明，當時所劃的55萬右派中，除極少數屬實外，絕大多數或者說99%都是錯劃的<sup>④</sup>。此情形在中共後來的總結中被表述為「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sup>⑤</sup>。而產生此現象的內在因素則是社會的「泛政治化」。在「泛政治化」的社會中，階級鬥爭成了一切工作的立足點，具體行動策略便是「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是共產黨社會政治工作的最重要策略。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社會，處處瀰漫着階級鬥爭的氣味，政治鬥爭形勢可謂風雲變幻。在無法準確掌握政治形勢的條件下，「寧左勿右」的階級鬥爭立場成了許多人的工作原則，「上綱上線」也就成了他們的護身符。特別是「從1957年整風、反右派以來，不停頓地批判『右傾保守』，批判反冒進，批判『觀潮派』、『穩妥派』、『秋後算賬派』，而對說大話、吹牛皮、放空炮，不僅不加批評，而且還予以鼓勵、表揚，甚至升官。這就造成這樣一股空氣：『右了』（當時通行着按指標高低分左右）不得了！『左了沒甚麼』<sup>⑥</sup>。

這種「寧左勿右」的思維是社會「泛政治化」的最鮮明體現，它將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化、階級鬥爭化，從而便於以階級鬥爭的方式處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就是這種「上綱上線」的結果。「如把說了幾句錯話，屬於認識上的問題，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把幾個人在一起的自由議論，說成是反黨小集團；把對某個或某些領導人的正常批評，說成是向黨進攻；把向黨交心，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說成是惡毒攻擊，思想反動；把在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不同見解，說成是反對馬



列主義等等」<sup>④</sup>，這些都是典型的「上綱上線」。

當然，此種「上綱上線」不只是基層的實踐邏輯。毛在反右開始後便不止一次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新式肅反」，是「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sup>⑤</sup>，以此將反右階級鬥爭化。這種「上綱上線」的結果，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政治氣候，從而左右各級幹部的行動選擇。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在1957年12月9日於省委所作的報告中就提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既可以表現為敵我矛盾，也可以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前一種情況是比較少數的，後一種情況卻是大量的。」<sup>⑥</sup>照此表述，人民內部矛盾中同樣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這改變了毛本人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將人民內部矛盾階級鬥爭化，是一種政策上的「上綱上線」。

但在反右的大形勢下，這一報告深得毛的賞識，賞識本身則向其他幹部傳遞着毛的喜好。果不其然，12月25日，柯慶施在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表達了和江華相同的認識。自然，他的報告也同樣受到毛的好評<sup>⑦</sup>。由此可見，在一個「泛政治化」的社會中，幹部「上綱上線」工作方式的產生，多是出於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結果。在上、下間共同營造的這種微妙政治氛圍中，反右鬥爭的擴大化也就難以避免了。

經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與汪文強調的國家與政治分離意義上的「去政治化」不同，「泛政治化」的鮮明特徵是國家與社會間的政治一體化。在建國後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種國家與社會的政治一體化未曾中斷。而文革時期的政治辯論以

及多樣性政治組織的出現，不僅不是國家與政治分離的表徵，相反體現的卻是國家與政治間的密切融合，只是這種融合是在社會範圍內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講，1960年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國家與社會的高度政治化。

### 註釋

① 汪暉和佟新、沈旭在其文革研究中，都將法國的這場「學生運動」與中國的「文革」相提並論。佟、沈甚至認為，中國文革為林蔭大道上的學生抗議提供了「反抗不平等戰略的原則」。參見佟新、沈旭：〈文革研究對認識中國社會的意義——一種國家與社會的視角〉，《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頁52。汪的論述亦可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頁5-6。

②⑥ 佟新、沈旭：〈文革研究對認識中國社會的意義〉，頁52。

③ 在筆者看來，1960年代世界範圍內的激進運動與文革之間實質意義上的勾連，應該是需要深入挖掘的，至少不能將類似政治運動看成是文革的簡單翻版。中國文革的世界影響不能被無限放大。

④⑫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頁5-41；10；13；10；12；22-23；35；7；9。

⑤ 2008年，汪暉又出版了一本同主題的著作，即《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周國興新近對汪暉的論述有過討論，不過他所關注的是「公共性／批判性重建」的問題，並沒有就具體歷史問題以及我們介入歷史的方式進行討論，應該說，他的論述從方法上仍然是在沿着汪暉的路子。參見周國興：〈公共性／批判性的重建：評《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開放時代》，2010年第1期，頁140-49。

與汪暉強調的國家與政治分離意義上的「去政治化」不同，「泛政治化」的鮮明特徵是國家與社會間的政治一體化。1960年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國家與社會的高度政治化。

- ⑦ 阿里 (Tariq Ali)、沃特金斯 (Susan Watkins) 著，范昌龍等譯：《1968年：反叛的年代》(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94、98。
- ⑧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1967年5月17日，第1版。
- ⑨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3：53-54。
- ⑪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28-29。
- ⑫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第1版。
- ⑬ 韓敏著，陸益龍、徐新玉譯：《回應革命與改革——皖北李村的社會變遷與延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119。
- ⑭ 韓丁 (William Hinton) 著，《深翻》譯校組譯：《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8)，頁483。
- ⑮ 這種情形在趙文詞等人筆下的陳村文革中體現尤為明顯。具體情況可參見陳佩華、趙文詞 (Richard Madsen)、安戈 (Jonathan Unger) 著，孫萬國、楊敏如、韓建中譯：《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94-127。
- ⑯ 〈序言〉，載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0。
- ⑰ 阿妮達·陳 (Anita Chan) 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頁3。
- ⑱ 有關「三反」與中共解決執政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運動中所體現出的道德主義情形，可參見張鳴：〈執政的道德困境與突圍之道——「三反五反」運動解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5年12月號，頁46-58。
- ⑲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人民日報》，1956年9月28日，第1版。
- ⑳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

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25、326。

㉑ 沈志華在對整風運動的研究中指出，毛發動整風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改進黨的工作作風，要解決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沈志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頁72-83。

㉒ 參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報》，1957年5月1日，第1版。

㉓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第4版。

㉔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41-42。

㉕①②③④⑤⑥⑦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630-31；634-35；638；641；746；644；644；652-53；653。

㉖⑧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3。

㉗ 施米特 (Carl Schmitt) 著，劉宗坤等譯：《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106。

㉘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3。

㉙ 有關建國初年社會政治化的討論，可參見滿永：〈生活中的革命日常化——1950年代鄉村集體化進程中的社會政治化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頁173-79；〈政治社會的初現——「鎮壓反革命」與1950年代初的皖西北鄉村〉，《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頁215-21。

㉚ 劉小楓就將文革視為一場發生於社會—政治層面的怨恨運動。參見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385。